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

王军[[1]](#footnote-0)2 ，冀文彦23，胡雅芬3

（1.华北科技学院管理学院 三河 河北 101601；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3.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研究基地 北京 100083）

**摘要：**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对于指导城市建设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是中国的首都，有着悠久和厚重的历史，最新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以及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背景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是党和政府科学运用马克主义观在当代伟大的实践，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情况及破解北京城市内部城乡不协调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北京市副中心的建立是北京市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北京城市副中心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十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聚焦[通州](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5%B7%9E/3873" \t "_blank)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进而确定了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2014年继续强化该战略，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2015年，努力把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新城，2017年12月20日，部分政府、人大及政协机构入住行政中心办公场所。北京市副中心的建设对于疏通首都功能，防止大城市病不断恶化有着深渊的影响和重要的战略意义。笔者将北京市副中心的建设置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以及国内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首先本文回顾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的经典内容，进而结合目前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的战略定位讨论北京市副中心的设立。笔者认为，北京市副中心的的建设，是党中央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结合中国城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尤其是北京城市发展特有的情况的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探索和尝试，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城市化道路的科学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观**

**（一）城市的产生**

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研究认为，城市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自然出现的，城市是历史的产物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力逐步得到提高，奴隶主为了更好的保护财产，抵御其他族群入侵，开始使用用垣围起来可以防御的以部落为单位的居住中心，这便是“城”的最初状态和本质。恩格斯最早提出“城市”的概念是“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2]](#endnote-0)，但此处的概念对于城市只解释了“城”的含义，因为真正的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概念，在此物理空间内还有架构城市的功能，是在社会不断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商品交易场所，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3]](#endnote-1)，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产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过对城市产生的历史过程和脉络细致观察之后，对城市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对于大城市的产生、演化、发展予以赞扬，评价其是文明水平的标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马克思曾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度、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度、地域局限性向民族过度的开始，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endnote-2).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乡的分离、对立以及城市的出现都是必然的结果，而城市本身就是生产要素集聚的表现。“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5]](#endnote-3)。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奴隶社会制度体系，城市的产生也意味着阶级对立走上历史舞台，意味着社会分工愈加的明确和扩大化。

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考察研究了城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产生、发展，演化及问题，对近现代城市上述情况同样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对于西方现代城市的发展脉络有着深刻的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方“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也是当时历史时期的“新型城市”的产生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大革命产生的。由于基础分工市场不断扩大，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各阶级在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大部分城市及农村被剥夺收入来源及生产资料的工人人口出现，工厂手工业出现了，马克思认为这是现代城市城市产生的基础，最后由于完全以交换为目的，采用货币作为传递媒介形式的真正商业的出现，不同商业种类和繁多的手工业，尤其是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在地域上结合，进而在一定范围空间不断聚集各种资源导致近代城市产生。

**（二）马克思城市问题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城市的观察具有综合性和前瞻性的，他们不仅从历史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角度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同时对于城市发展产生的问题也进行了阐述。

首先，马克思与恩格斯坚持以变化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视角看待城市产生后具有的功能，他们认为城市的扩大虽然是商业交易以及政治需求不断壮大的结果，但城市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相反，他们精准发现，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不断增加，在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体系条件下，以及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城市的扩张，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城市不断剥削乡村资源；第二会在城市内部造成一系列影响，城市病的出现以及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城市病的出现在西方尤其的突出，尤其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化的发展，废弃、废水排放污染环境，尤其是大城市病的表现更为突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著作中详细的描述了大城市病的情况，“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患慢性病的却很多”同时由于机器的普遍使用，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剥削加重，工人本身也被束缚于专门的工作技能，一旦实业很难就业，所以城市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各种工人阶级政党不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曾讲；“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是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6]](#endnote-4)而当时代西方农村的情况与城市截然相反，农村整体是隔绝和分散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及资源集中在城市。

其次，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城市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政治层面的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第一，夺取城市政权，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和人民的意志对城市进行建设或改造城市。第二是通过合法的斗争，通过影响政府的力量，对抗无形且强大的资本力量，进而对城市产生影响。除此两个主要方式外，恩格斯面对工业化对城市的负面作用，在《自然辩证法》警告人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由于城市资源相对于农村的巨大不平衡，很难真正从本质上解决除城乡对立，所以消灭城乡对立，实现资源的均衡分配，实现人与人真正的公平，需要城市和农村均衡和谐的发展。

**二、北京城市历史与现状**

**（一） 北京城市历史**

北京城不仅是中国历史古城，更是中国政治的象征，是中国的首都，根据梁思成先生的记载，是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北京这个位置，它在华北平原的最北方位，坐落于两条大约平行的河流中间，西面和北面被一条弧形山脉环抱，位置的选择是中国古人同自然斗争中得到的大智慧。

历史上北京城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经过四次改建，不仅仅体现在土木工程的修建，也有整体位置的移动，目前北京的前身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唐代时期的“幽州城”，位置在现阶段北京城区广安门附近，是当时范阳节度使办公及军事驻扎地，历史上奕是边界沿线军事防卫重镇，后刘仁恭父子二人在北方自立称帝后，将城中的“子城”改建为宫殿，五代十国时期，辽将其升级为“南京”，北京逐渐成为区域政治中心。之后金人灭辽，1151年在仿照北宋汴梁的形制，在辽“南京”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这也是历史上北京城第一次大规模改建，此时北京在历史上称为“中都”。1215年北部元人入侵，“中都”遭受大规模破坏，1267年元代便开始以当时的离宫为物理中心建造新的封建帝都，元大都的的元代皇宫围绕当时北京中心的北海、中海建设，形状为正方形，北京位置也向东北迁移了很多。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初立，明成祖朱棣夺取最高政权后迁都北京，因衙署及各种办公场所不足，1419年将南城墙向南拓展，由长安街线位置移到建国初期北京城位置，南北两墙经过大规模改建，北京城整体向南平移约四分之一，是历史上北京城的第三次大规模改建。明朝中期，女真民族逐渐崛起，东北方向军事压力及危险性提高，为应对军事威胁，在北京城外建造外城意义重大，公元1553年建造完工，至此历史上北京城四次大规模改建结束，清朝基本继承明朝的北京。

北京城在历史上有着辉煌而厚重的历史，北京的城市格局也呈现出中轴线的特征，大体来说，北京城市形状为“凸”字形，以行政为中心的内城整体位居北部位置，外城位置在南，内城核心就是目前所见的故宫，它奕是全城布局中心，整个北京城围绕故宫规划和建设，在这一经典部署中有一条直线，长达约八公里，横贯全城，北京城所独有的城市魅力和俯视景观中壮美秩序都因此轴而来。北京的历史形成交通系统，及其合理，稍加展开和整理就非常理想，同时北京城中有着大量的文物建筑，这都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二）北京的现状**

如今的北京在建国后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速的发展，璀璨的文化以及在世界城市的地位愈加重要。但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及北京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虹吸效应背景下，数量巨大人口以及更多经济资源向城市集聚，北京特大城市病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北京大城市病的最突出、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截止2016年初，经统计北京常住人口已达至2170.5万人，已经突破北京市到2020年政府计划控制人口在1800万人左右的目标，按人口结构统计，北京正式户籍人口增长却只占到23.9%，而外来人口增长占到76.1%。北京市人口规模在全国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市，位居第二位，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北京不堪重负，北京政府公共资源承受巨大压力，尤其是北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能满足需求。

其次，北京大城市病的表现之二是交通拥堵，截止2017年年末，北京小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540万辆的高位，位居全国第一，中心区交通日出现量达到近5000万人次，早晚高峰路网平均速度只有20多公里，工作日拥堵时间接近2个小时，人均通勤时间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市中心拥堵状况更加糟糕，较长的通勤时间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效率，也降低了市民的幸福感指数。究其原因是北京城市规划及建设不尽合理，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存在问题，单中心格局的状况始终没有突破。城市中央区功能过多，六个行政区级单位平原面积占21.3%，总体GDP占到70%，居民总体消费近77%，提供三产服务比例高达80%[1]。加上北京本身轨道交通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轨道交通停站点密集度不够，以及地铁站分布与城市功能区部分错位，致使北京交通承载量超过负荷能力，交通拥堵已成为北京生产生活的常态表现。

第三，北京城市病的表现之三就是主要资源匮乏，尤其是水资源相对匮乏，由于水资源的约束，使北京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北京位于北纬40度左右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平均降雨量只有600毫米，但主要集中在7、8两个夏季月份，其它时间连旱连涝降水特征明显。北京河流用水主要来自东部的潮白河、蓟运河，南部的永定河及大清河四大水系，由于而官厅、密云两大水库周边客观环境基础较弱，加之人为破坏致使整体环境不断恶化，纯水量从九十年代起逐年下降。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北京地表水匮乏造成地下水超采，并受整个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影响，已经形成近2000平方公里漏斗区。从数据上看，北京人均水资源在100立方米左右，只有全国平均值的二十分之一。其他资源中北京约70%的用电量，40%的成品油以及大约98%的煤炭，100%的石油、天然气都需要外部供应，北京整体资源需求压力过大，城市运行风险较高。

第四，北京城市病的表现之四就是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依旧严峻，空气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国家最新标准差距较大，其中空气中PM2.5含量一直高值运行，大气污染不仅是工业生产产生的，也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空气的持续难于好转，不仅对于北京吸引国际高端人才造成困难，市民因环境污染疾病发病率明显上升，已经威胁市民对于环境安全的基本诉求。不仅如此，北京2000多万的人口城市，众多的产业企业，产生大量的垃圾，污水，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依然难以乐观，城市环境承载力超负荷运行。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地位**

北京出现大城市病客观因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矛盾无处不在的体现，共产党人不断客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建设的国情相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价值，是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必然结果，同时对于更好的治理北京大城市病，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立有利于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状况**

如前面对北京现状问题的描述，北京存在人口快速增长、交通拥挤、资源匮乏以及环境污染等明显的大城市病，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言：“夺取政权，改造城市”，此时是运用国家的意志对北京进行科学改造，让北京真正成为国际宜居之都，绿色城市，和谐城市，缓解首都压力，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立，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在通州农村平地新建一座智慧之城，海绵城市，科技之城，并作为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场地，进而北京的首都政治中心功能与北京市政府的政府功能相分离，首都和北京政治功能分离是马克思城市观的灵活运用，是治理大城市病的宏观理念。而副中心建立后北京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也将带来以下影响：

第一，北京市政府四套班子搬迁出北京核心区，同时会运用北京市属资源在北京行政副中心配套城市功能，诸如医院，学校以及相关服务业。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于商务办公、文化旅游等功能，也将吸引中心区商务及产业外迁，不仅使北京中心区核心区域空间密集程度得到缓解，对于在中心工作和需要办理业务的通勤交流量会相应减少，资源利用空间转移，市中心资源使用量会下降，总体上无论在人口、交通、资源还是环境方面，在北京外围设立行政副中心将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中心区的各种压力。据估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立会带动新城地区近40万的人口就业，在空间格局上形成“城中心—CBD商业区—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格局，有利于产业的疏解转移和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点[2]。

第二，除了以上大城市病问题，北京还存在诸如健康危险、城市安全、住房紧张等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显现的，有些是隐性的，但是都会带来北京在社会层面的各种问题，容易滋隐患，发生危险，甚至加重社会矛盾，例如北京住房紧张及高房价问题，其一，住房紧张导致高房价，高房价导致很多在北京工作的人口缺乏购房能力，导致子女无法入学等一系列问题，此问题长期积累使社会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以及政府矛盾不断加大，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从而引发重大社会问题；其二，高房价导致部分贷款购房者生活成本加大，生活质量下降，也容易滋生社会问题，尤其是诚信及犯罪问题，其三，住房紧张及高房价还会对年轻人造成冲击，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断奔波，进而削弱北京整体创新能力。而北京副中心的建立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高房价问题，住房紧张问题，同时降低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减少城市安全隐患。

**（二）北京副中心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

北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城市规划、产业布局、还是重点工程方面对非中心地区关注偏低，财政投资不足，民间资本引进不足，非中心区的基础建设也远远落后于中心区，公共服务设施及商业服务更是相对落后，而北京非中心地带有大量的乡村地带，北京地区内部本身发展也极不平衡。城市本身的义务、责任和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中心论的涵义所在，该思想和理论虽然强调城市领导农村，但这种“领导”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他认为这种“领导”是建立在平等、协调的基础上，要求城市与乡村实现合作与融合[3]。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不要造成城乡的对立，要消灭城市剥削农村。

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立，它的选择是在潮白河边上，地处北京市边缘，几乎已经与河北省接壤，市政府的大楼更是建设在通州的农村。马克思也清醒的意识到消除农村差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长期看也要发挥城市本身的优势，当物质财务积累到一定时期后消灭城乡对立。而党中央对于北京城副中心的建立恰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破解城乡对立，协调，融合乡村一体化的战略选择。首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建设，不仅聚集了大量的国家资本，也能撬动大量的民间资本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需要配套交通设施，公共设施，生活设施，商务设施以及大量的公园绿化公园的开建，整体项目持续数年，根据“虹吸效应”理论，加上国家行政手段疏解首都功能，副中心也将中心区优质资源吸引过来，将来在这片农村之地必将集聚大量优质资源，包括形成经济增长的产业资源。在北京CBD商务区到副中心的广袤农村土地上形成特有的产业集聚和商务活动。其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位置本身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空间格局中，南，西，北是北京辖区农村，向东是河北农村地带，所以，副中心的建设中规划了完善的交通系统，从公路到轨道交通，从市政公交到铁路运输围绕在其周围的广大乡镇，农村必将与副中心协调，融合，至少从目前来看，副中心与与周边的环境协调，交通协调，通信协调，行政管辖协调，共同治理协调等工作开展的已经初见端倪。而在京津冀协调发展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的战略价值已经显现。

**参考文献：**

[1]赵弘，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经济与管理，2014，（3），5-9.

[2]赵弘，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J].城市问题.2009。（5），36-40.

[3]寿思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与中国城镇化观察[J].改革与战略,2014。（2），89-85.

**On the Strategy of Beijing Subsidiary Ce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Urban View**

WANG Jun, JI Wenyan, HU Yafen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he, Hebei 101601, China;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City,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Urban view of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theor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Beijing is the capital of China with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The latest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the city is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enter, cultural cent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evacuation of Beijing non-capital functions, the strategy of establishing Beijing subsidiary center is a great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Marxism from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asing urban diseases and tackling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eijing subsidiary center is the optimal choice for Beijing to become a world-class harmonious and livable city.

**Key word:** Marxism; urban view; Beijing subsidiary center

（责任编辑：汤文仙）

1. 收稿日期：2018年09月30日

   作者简介：王军（1984-），男，河北保定人，会计师，博士，研究方向：创业管理，城市经济与战略。

   冀文彦（1982-），女，内蒙古包头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管理，城市可持续发展。

   胡雅芬（1983-），女，江西新余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管理、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北京市环境规制绩效评价研究”（课题编号：17JDGLB02）。 [↑](#footnote-ref-0)
2. [↑](#endnote-ref-0)
3. [↑](#endnote-ref-1)
4. [↑](#endnote-ref-2)
5. [↑](#endnote-ref-3)
6. [↑](#endnote-ref-4)